



唐朝公务员亦需“公考”

每年的国家公务员考试是许多人非常重视的一次考试。其实,在古代,唐朝有些官员就是通过“公考”选拔的。

科举始于隋文帝时期,它是一种不分出身和民族、按考试成绩选拔国家官员的制度。隋炀帝时期,科举制度得到了推广和普及。不过,科举制度还是在后来的唐朝才成熟完善起来。通过中央政府——朝廷考试者,称为进士。普遍的认识是,只要考上了进士,就可以做官了。其实,这是一种误解,进士本身不是官员,更类似于今天的学位,还要等待朝廷的具体任命与安排才算正式做官。

在唐朝,缺乏门第背景的知识分子希望在仕途有所发展,主要的人口有两个:科举和幕府。科举成功,算是取得了进入官场的资格;而幕府是一些有势力的官僚为自己政治团队选拔后备力量的一个途径,如果幕僚表现出色,或者得到了官僚的赏识,可以被举荐成为朝廷正式的官员。中晚唐时期,很多官员都既有考取科举的资格,也有作为幕僚的经历。

除上述两种途径,还有一种有点像今天的公务员考试。晚唐诗人李商隐就参加了类似于今天的“公考”。李大诗人的前身也是一“草根”,10岁左右,父亲去世。父亲一死,李商隐和母亲、弟妹们回到了河南故乡,生活之艰难可以想象,靠亲戚接济过活。李商隐是长子,因此背负上了撑持门户的责任。少年时代的李商隐没别的什么特长,只能为别人抄书挣点钱,以贴补家用。困窘的家境,使他分外地想考取功名、早日做官,改变贫穷的局面,并光宗耀祖。于是,他和许多寒门弟子一样,踏上了漫漫考试路。

开成二年,李商隐考取了进士,这算得上是惊天大喜了,但他并没有因此而立刻做官。在考取进士之前,李商隐参加的殿试有过好多次,都是无一例外地失之交臂。考取进士的那一年,李商隐还只是一普通百姓,要当官,还得考。开成三年,李商隐参加选拔官员的考试,复审没通过,使他获得朝廷正式授职的时间又推迟了。开成四年,李商隐再次参加授官考试,皇天不负有心人,终于顺利通过,得到了秘书省校书郎的职位。虽说是一个低级的官职,但还是有一定的发展空间。没过多久,他被调任弘农县尉,虽然县尉与校书郎的品级差不多,但有了点实权。
(据《西安晚报》)

薛谭学讴与孔子学琴

先说薛谭学讴的故事。
《列子·汤问》中有一段文章:“薛谭学讴于秦青,未穷青之技,自谓尽之,遂辞归。秦青弗止,饯行于郊衢,抚节悲歌,声振林木,响遏行云。薛谭乃谢求反,终生不敢言归。”

通俗一点说:有一个叫薛谭的人,拜歌唱家秦青为师,学习唱歌。学了一段时间,自认为把老师的技艺完全学到了手,于是执意求归。秦青并未阻止他,也没讲什么道理,而是答应他可以回去。薛谭临走时,秦青在郊外的大路口还为他饯行。只见秦青和着乐器,高歌一曲,结果“声振林木,响遏行云”(歌声把林中的树木都震动了,那回声止住了空中的流云)。薛谭大惊,赶紧请老师恕罪,恳求留下来继续学习。

再讲孔子学琴的故事。

《史记·孔子世家》中有一篇文章,原文如下:
孔子学鼓琴师襄子,十日不进。师襄子曰:“可以益矣。”孔子曰:“丘已习其曲矣,未得其数也。”有间,曰:“已习其数,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志也。”有间,曰:“已习其志,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为人也。”有间,有所穆然深思焉,有所怡然高望而远志焉。曰:“丘得其为人,黯然而黑,几然而长,眼如望羊,如王四国,非文王其谁能为此也!”师襄子辟席再拜,曰:“师盖云《文王操》也。”

通俗一点说:孔子向师襄学习弹琴,一首曲子已经弹奏了十天还不学新的。而老师师襄认为已经弹得很好了,就告诉他可以学另一首;可孔子却说:“我只是熟悉了曲子,并未掌握这首曲子的弹奏技艺。”又过了几天,师襄说:“你已经掌握了曲子的技艺了,还是换一首吧!”孔子说:“我还没领悟曲子的丰富内涵呢。”又过了几天,师襄对他说:“你已经领悟得很好,该弹新的了!”孔子又说:“我还没想象出这首曲子所表现的人物形象呢。”又过了一些日子,孔子高兴地对师襄说:“我看到了——这个人黑黑的,个子高高的,眼望着前方,仿佛要称王于四国。这个人不是周文王又会是谁呢?”师襄听了,十分惊喜,于是“避席再拜”说:“这首曲子正是《文王操》啊!”

认真读了这两篇文章之后,我有以下几点感受。

一、作为学生,在学习要谨防浮光掠影和好高骛远的毛病,千万莫把一知半解当作一目了然;作为老师,则要时刻警惕学生的浮躁毛病,一旦发现,就要针对不同的对象,创造性地给他们开方治病。你看,秦青给薛谭开的是人文性药方,这种药方没有任何一味具体的药物,甚至医生连一句话都没

说,让患者出了一身冷汗,病就好了。我们当老师的应该从中学到什么?
二、当老师的最忌好为人师,尤忌在学生面前,总是居高临下,认为自己什么都比学生强。孔子拜师襄为师学习音乐,然而当学生的孔子却使当老师的师襄大受教育。孔子不是老师说什么就听什么,老师叫怎么做就怎么做,而是运用自己的头脑,独立思考。这恐怕也是他成为圣人的重要原因吧。对于学生的这种精神,我们不仅应该鼓励,而且应该虚心向他们学习,甚至干脆放下架子,拜他们为师。在这一点上,师襄是我们的榜样。请看,师襄听了孔子的话,“避席再拜”。古人席地而坐,避席就是从席位上站起来,表示敬意;再拜就是磕两次头。师襄的表现,告诉我们,他拜孔子为师了。伟人也,师襄!

三、现在教育教学培训中,某些专家“创造”出来的新词,诸如“以学定教”“合作学习”“翻转教学法”“发现法”等,琳琅满目、目不暇接。使我感到奇怪的是,我国古代与近代教育家经典的教育理论与实践,为什么很少出现在这些培训专家之讲座或论文之中?中华民族有“海纳百川”的胸怀,凡是先进的理念与技术,不管来自西洋东洋,一律“洋为中用”。但我们的原则是:借鉴不等于照搬,参照不等于投降;我们的根是中华传统教育思想与智慧,我们的方向是守正创新。所以,我冒昧地提个建议:某些培训专家先生们,能不能静下心来好好读读中华古代经典(古文并不比外语难学),从中汲取古人的教育思想与艺术,以便更好地完成国家交给你们的神圣任务?

文末,我禁不住有点脸红。为什么呢?
我的诤友批评我时,常用的词就是“好为人师”。说心里话,自己也不是不知道,可就是改不了。不过,学生表现出来的创造性,以及他们往往把我驳得面红耳赤,陷我于尴尬处境的事实,使我内心受到极大的震动,真的感悟到“教然后知困”的深刻内涵了。

我曾给四十多年前的一位学生(青年作家)准备发表的文章挑了几个错字,并且幽默了一下:“错字大王也能称为作家?”结果,这位学生从我已发表的文章中挑出了错字:“甘冽”写成了“甘冽”,而且回敬道:“错字大王也能当得教授?”哎呀,真是羞煞我也!

文/李淑章

